

高校改革与发展参考

2010年第21期（总第42期）

中国矿业大学发展规划处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日

【编者按】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影响到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学。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要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意义非常深远。世界一流大学距我们到底多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真有“中国模式”吗？本期《高校改革与发展参考》收集近阶段关于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和推进高校发展的最新动态的相关资讯，供各位校领导参考。

本期目录

理论探索

对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道路的辩证思考..... 3

动态信息

国内顶尖大学校长齐探讨 如何圆世界一流大学梦..... 9

九大学校长支招南科大:一流大学距我们到底多远..... 13

高校校长热议大学建设好大学需吸引力和生产力..... 17

建世界一流大学国家动作不断 形似容易神似难..... 18

对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道路的辩证思考

耿有权

摘要：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然要进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是人为努力和实践的过程，而且也是客观辩证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从“谋求形似”到“争取神似”、“形神兼备”；从“物质建设”到“精神建设”、“制度建设”；从“羡慕尝试”到“模式效仿”、“创新模式”；从“学术依附”到“学术独立”、“学术繁荣”；从“国内一流”到“亚洲一流”、“世界一流”。应该说，这是我国“985”重点大学实现世界一流梦想的必然建设道路。

目前，我们正走在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征途中，至于我们离前面的奋斗目标还有多远？浏览一下，除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把建成时间设定得短一些以外，其他各所重点大学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把21世纪中叶前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自己的里程碑。因此，我国要真正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势必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既是人为努力和实践的奋斗过程，也是客观辩证的发展过程。

“路遥知马力”，希望人们在科学评估和正确认识中国重点大学“马力”的同时，也能对这个辩证发展的建设道路有一个清醒、自觉的理性认知。

一、从“谋求形似”到“争取神似”、“形神兼备”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对中国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伟大事业。如果把当今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我国重点大学争创世界一流的现实目标，那么不难理解，我们必然要走一个从“形似”到“神似”直至“形神兼备”的发展过程...。所谓“形似”，是指形式上如同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模样”，如“综合性”，但内容上还没有达到要求，如缺少大师人才。所谓“神似”，是指在精神追求上基本达到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度或水平，如善于承担人类使命，挑战人类未知领域。相对而言，“形似”比较容易，如很快就能建成一座类似哈佛教学楼的建筑物，而“神

似”则比较困难或难度很大，如拒绝权贵干扰学术独立。当然，理想的境界是“形神兼备”，即我们创建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涵及精神境界上都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度和标准。不过，即使到此阶段，我们也要反思一下，这种“形神兼备”究竟是别人的翻版？抑或自己的创造？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切忌把是否与西方现有一流大学一模一样作为追求的高度，而应有中国的独立思考、建设理念和发展模式，同时，她在未来还应是别人羡慕或模仿的榜样，就像西方一流大学今天影响我们一样。

诚然，随着“211”特别是“985”工程的稳步实施，我国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而且未来建设的步伐还在不断加速。但是，目前，我国重点大学似乎还没有走出“形似”阶段或者说没有真正进入“神似”阶段，而“形神兼备”就更遥远了。具体说，不少重点高校虽然树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盖大楼、扩实验室、搞基本建设的“形似”阶段，少数重点高校，虽然大楼竣工了，设备增加了，条件变好了，“形似”有了进展，但因贷款太多，摊子太大，负担过重，却无力做“神似”的工作。因此，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们务必减少“形似”，增加“神似”，这是我国有朝一日实现“形神兼备”世界一流大学梦想的关键。

二、从“物质建设”到“精神建设”、“制度建设”

从物质到精神到制度，从物质建设到精神建设、制度建设，这是国内外任何大学建设必须包含的内容及经历的实践过程。物质是基础，精神是动力，制度是保证。“三大建设”可以重点推动，也可以综合推动，但它们缺一不可。如果说，世界一流大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代表性产物，那么，她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完美体现者”。英国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sby)曾说过，任何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当然，其中也包括校园环境。其实，要培养创造性人才特别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何尝不需要优美的育人环境？但是，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流的大学精神及配套制度，尤其是拥有对人才的尊重、对人性的呵护、对

人类的关心和爱护的境界追求。实际上，凡是访问过欧美等国著名大学或翻阅过留学欧美的人员的见闻、感想、纪实，谁都可以亲眼看到或想象得到一流大学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人、爱护人、培养人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氛围。恰如芝加哥大学前校长金伯顿所言：“有许多无形的东西使得一所大学变得卓越并保持卓越。”

我国不少重点大学在“三大建设”上与国外一流大学还有不小的差距。具体说，我们过分强调物质(金钱)及其建设，忽视大学精神建设包括大学制度建设，不少大学表面上侧重于“两手抓”，一手抓基本建设，一手抓制度建设，但鲜有力量抓精神建设，即使是制度建设关键点也没有找准，反映在管理上就是思考和落实“如何管住人”而不是“如何服务人”。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近日历数“大学教育八宗罪”，可以说国内重点大学“都有份”：“官本位浓厚、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跌、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经济严重、人文精神模糊、改革步伐缓慢”。众所周知，近年来影响甚大的“钱学森之问”以及有关西南联大和蔡元培校长的各类文章不断增多，其实质就是向国家、社会和大学呼唤有改革气魄的教育家。中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少重点大学在国家投资上不低于多数国外大学，但在精神和管理上逊于国外，而后者是大学的灵魂。问题究竟出在哪？在我看来，不是物质，而是制度，特别是精神。因为任何大学，物质建设总是不断推进，制度建设也要日益完善，而精神建设始终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师生需要的人性化服务，不仅一刻不能缺失，而且要“日进，日进，日日进”。大学要让所有的物质、制度服务于“人”。一旦大家都这样做了，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就不远了。

三、从“羡慕尝试”到“模式仿效”、“创新模式”

回顾大学发展史，究竟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以及怎么样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中国人不是先知，其实外国人早先也不知道。“从历史来看，德国和美国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连‘一流大学’的概念都没有，更谈不上靠什么一流大学理论来指导其建设了。”但是，由于“大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其精神气质就是一种‘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因此，中世纪以来，各国大学都是采取相互学

习、借鉴的建设方式，各自走出了从“羡慕尝试”到“模式仿效”再到“模式创新”的建设道路。就国家来看，英国曾羡慕学习法国，德国曾羡慕学习英国，美国曾羡慕学习德国，中国曾羡慕学习欧美。就大学来看，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曾学习借鉴法国的巴黎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曾学习借鉴英国大学，耶鲁大学曾学习借鉴哈佛大学，而北京大学是由蔡元培校长学习借鉴德国模式而来。同时历史上，意大利、英国大学都不是纯粹地模仿法国大学，而是进行了模式改造，英国学者纽曼阐述的大学思想就是对法国大学理念的超越；德国教育家洪堡对英国大学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形成了独特的柏林大学模式；19世纪，美国大学学习、借鉴德国大学，也是经过模式创新才实现的。这既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生动表现，也是大学辩证发展的历史结果。

这表明，大学建设始终渗透着人类的精神，不断推动创新发展的。因此，对待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站在全球视野和人类文明视域中来考察，并且要在模式上进行创新发展。回顾历史，中国大学在学习国外大学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曲折和挫折，但是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今天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要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善于走过学习模仿阶段，敢于、勇于、善于研究、发现、构建自己的建设模式，大胆超越现有的“西方模式”，着力打造有富有特色的“中国模式”。可以说，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是为了早日实现邓小平提出的教育的“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源与动力；“面向世界”，是所有世界一流大学的自然本性；“面向未来”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应有境界。

四、从“学术依附”到“学术独立”、“学术繁荣”

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指出：“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可说是争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本质上就是为了取得国家的学术独立和学术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然而，各种复杂性因素决定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说，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学术依附”到“学术独立”再到“学术繁荣”

的历程。何谓“学术依附”，简言之，就是学术上依靠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台条件发展，难以独立开展行动。其关键原因和突出表现有二：一是世界各类学术中心及各种国际权威期刊全部处于西方发达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学术资源严重不足，甚至完全依靠发达国家来评价和支持，同时，国际留学生大多流向并聚集在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二是受到殖民历史和发达国家教育输入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难以获得学术自立，国内不少重点高校使用国外大学教材就是重要案例。但是，21世纪，中华民族若要实现伟大复兴，则必须实现学术独立和学术繁荣。对此，我国重点大学无疑承担着重大责任——要通过各种努力尽快摆脱对发达国家的学术依附地位。一是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精神动力，以优势学科为基础抓紧建设“全球学术中心”。二是创建和发展中国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逐步把它们建成全球权威性学术期刊，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评价的依附地位。三是用好国家重点投资，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平台，吸引人才包括国际留学生到中国学术中心学习、访问和从事科学研究，为中国发展作出贡献。四是抓紧利用“孔子学院”等渠道和各类学术媒介宣传和普及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使汉语逐渐转变为全球主要学术语言。

如果一个国家想维持甚至提升国际影响力，它就必须发展独立而强大的国家学术能力以及保持“学术繁荣”，而“学术依附”只能使一个国家站在国际影响力的边缘。毫无疑问，世界一流大学肩负着重大而光荣的责任和使命。前不久，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指出：“一国的历史和文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会以何种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历史每一个曾经称霸的国家或者大陆都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展示其实力。比如欧洲的典型方式就是海上扩张加殖民帝国，而美国则是空中优势和全球经济霸权。中国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后，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文化等方面完全改写世界秩序。”这确实是一个十分新颖的观点，对中国大学富有启发性意义。如果未来的中国诚如马丁·雅克所言，那么，通过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必将会迎来期待已久的学

术独立和学术繁荣的美好前景。

五、从“国内一流”到“亚洲一流”、“世界一流”

我国重点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过程，每个重点高校只能遵循从“国内一流”到“亚洲一流”、“世界一流”的发展路径。不过，这里我们确实要弄清什么是“世界一流”？美国高等教育专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的解读十分精辟、透彻，他指出：“世界一流只是简称，表明进入了全世界最有名大学的行列。几乎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如今都在主要的英语国家或者少数在大型工业化国家。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毫无例外。但并非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是世界一流大学，也不应该都是世界一流大学。”他继续说：“这些定义和概念的使用在全世界都相当混乱。政策制定者提到世界一流大学时，实际上可能是指研究型大学。学校领导也可能把本校当作世界一流来推销”，即使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地位。国家旗舰大学有时也会把自己描绘成地区或国际的一流大学。因此，为了实现目标而仔细定义一下这些术语非常有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重点大学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务必要做好自己的大学定位，并实现科学发展。目前，从“985”高校来看，可以被视为中国“旗舰大学”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显然是肩负着最早实现中国世界一流大学梦想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任务，而其他重点高校，可能需要认真地定位自己的发展目标、制定自己的战略规划。应当说，这是我国“985”重点大学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必须采取的战略步骤。

诚然，对中国任何重点大学来说，要从“国内一流”达到“亚洲一流”、“世界一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国内一些高校(如北大和清华)在国内一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是“亚洲一流”，还需要国际论证。事实上，对于国内一流大学，无论是争取“亚洲一流”，还是争取“世界一流”，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而深入的努力才能实现。21世纪上半叶，对于“985”高校来说，在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上，要坚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顺应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潮流，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精心谋划未来十年

乃至更长时间的战略规划和发展计划，以引导和激励广大教职工、学生共同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发展道路和具体步骤上，要努力从“谋求形似”到“争取神似”直至“形神兼备”；要同时推进“物质建设”、“精神建设”和“制度建设”；要尽快从“羡慕尝试”走过“模式仿效”达到“模式创新”；要争取从“学术依附”走向“学术独立”，并进入“学术繁荣”阶段。如此，属于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将早日到来。

国内顶尖大学校长齐探讨 如何圆世界一流大学梦

国内9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们在10月10日至12日齐聚复旦大学，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联谊会。不仅是老友间的叙旧，他们更为一项重大的使命而来。在民众普遍对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不甚满意的情况下，校长们此次探讨一个雄心勃勃的话题：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这9所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它们是首批进入国家“985工程”的大学，也因此结盟，在2009年组成号称C9的“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欢迎辞中道出了它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舍我其谁的自信与担当，他说：“以这9所高校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肩负着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引领社会发展、担当国家重任的优秀青年。”

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

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受邀为会议做报告，他谈到了自己“对过去10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到了可以更好地把握规律的时候，到了形成自己特色的时候，也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尽管，他认为，我们的大学在学术领军人物、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他还是乐观地判断：“通过中国模式的发展，我们现在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击的较好基础。”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忍不住向郭主任提问：世界一流大学看起来有多种标准，是不是存在中国模式？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郭新立的回答让人听起来觉得有点勉强。“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体现中国的元素，打下中国的烙印，你说这是不是中国模式？”他说，“我认为从中国的发展出发就是中国模式”。

接下来几位谈到中国模式的大学校长，都没能对它作出清晰的界定或具体的设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此寄予厚望，并高调以类似于口号的形式提出。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他的最近一篇文章中对中国模式作了大致的限定：如果我们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他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如果以此来衡量中国大学的办学之道，我们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有人认为，大学校长们的中国模式论其实反映了他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急切心情和试图告别生活在西方阴影下的想法。杨玉良校长就希望中国一流大学能有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他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长期处于学习、模仿、追随西方的状态表示不满。“如果我们不摆脱这种外部价值观的统治，发展中国的大学，就很难改变其依附和从属的地位，而站在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心和前沿。”杨玉良忧虑地说，如此一来，建设一流大学就是空话，就是一种自娱自乐，关起门来自我安慰性的东西。

在这位校长看来，突破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一流大学建设一定要走出中国特色的新路。他充满激情地说：“中国的大学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大学，应该独立自主于西方设立的规范和限制，应该是坚守和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而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舌之鹦鹉。”因此，他认为，对今天中国的一流大学来讲，除了要争取世界各国大

学成功的两大要素：大学自治和学术思想的独立自由，还要加上“我们自己大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意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列举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某些共性，如若干学科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教师队伍中拥有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大师，具有优良的大学精神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同时每所一流大学都为本国本民族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说：“在这样一个民族国家时代，没有超越国界的大学，他们对人类的贡献，首先在于对所在国家实现现代化或者保持强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首先必须赢得国内的普遍认同，仅从这一点来看，它们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还有不小的差距。

用奥运精神真能办好中国大学吗

据袁驷副校长了解，不管是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还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它们能够领袖群伦，都是以本国整体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为基础。“要真正形成中国模式绝不是由中国某个大学的单个形式出现，绝不应该是一花独放，而应该是群体的方式出现。”他说，“因为中国的一流大学在当前面对的问题是相似的，而模式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并有效地实施，再有一些成效那就是模式。”

C9 联盟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其确定的一大目标就是要“联合共赢，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眼里，这不是大话和空话，“只要剖析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案例——西南联大的成功之道，就可以相信我们是能成功的”。

但陈骏反思说，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将近 70 年，中国大学建设发展的条件、资金显然都大大超过当年的西南联大，但今天的中国大学仍然难以超越当年西南联大的地位和影响力，其差距究竟何在？他认为最根本的差距在于，西南联大有支撑着整个大学师生的独特的文化精神，而现在的大学却缺乏这一点。

他由此指出中国一流大学走向世界舞台的必由之路：在当今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中，必须倡导和践行返璞归真的大学文化，才有可能展现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和文化精神，才能与其声誉和社会期望相适应，并让世人受到鼓舞，感到希望，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风气，也才有可能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展现中国大学联盟的整体实力。

这位相信精神力量的大学校长甚至认为，如果能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奥运精神”和“世博会精神”迁移到“C9联盟”文化精神的创建之中，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就没有攻不破的难关。

只能按教育规律办学

对于一些同仁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作出了冷静的思考，他在会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把一种模式作为引领中国大学发展的趋势，这是错误的。他建议大家不要把中国模式的发展作为关注的中心。“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按教育规律办学。”郑校长说，舍此无他途。

由于国情和体制不同，完全照搬西方大学的发展模式在中国显然行不通。郑南宁说，世界一流大学是有标准的，但各国可以有不同的模式。

密歇根大学是美国公立大学的典范，陈骏在谈到来自美国大学的启示时，引用了该校前校长杜德斯达特一段话。他说：“我屡屡被人问到与‘密歇根模式’或‘密歇根秘诀’有关的问题……这所大学对多样性的追求非同一般的坚定与成功；它集公立和私立大学二者之长的混合型筹款模式；它免受政府干涉的强大自治；让密歇根大学有能力去创新，去冒险地对质量、规模和能力这三者非比寻常的结合……密歇根大学把各种特征巧妙结合在了一起，努力服务于一个处于变革中的世界。”

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创立，和中国几乎处于同一个时代，它以1877年东京大学的建立为标志。但日本在学习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同时，在短期内就具备了与西方大学并驾齐驱的高等教育实力，至今，日本的国立大学已经产生18位诺贝尔奖得主。郑南宁校长在会上分

享了他考察日本高等教育的体会，他认为这个国家的办学之道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据郑南宁介绍，10多年来，日本国立大学都是文部科学省管辖的一级行政组织，它的校长由政府任命。在法人化改革前，国立大学的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但政府提供充足的办学经费，并不干预校内的学术活动。他说，这种完全中央集权似的行政管理模式，使得大学的“学术群体”在一个规范、清晰的管理下进行，大学自身只需要专心致志做好教育教学和教育研究等工作，而不用担心经费问题。

2004年4月，日本国立大学正式启动了法人化改革，不再作为政府直接管理的行政组织一部分，成为独立自主运营的法人实体，政府与大学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即管办分离。郑南宁说，这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几点启示：一是立法先行，以法律和制度建设逐步推进大学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在法律的形式下确定政府和大学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并予以保障；二是充分发挥拨款机制的作用，在保证非竞争性拨款的同时，引入有导向性的拨款，实现政府对大学的间接管理；三是在大学内部一定要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确保学术自由。

（摘自：新华网站，2010-10-14）

九大学校长支招南科大：一流大学距我们到底多远

【编者的话】

南方科技大学的目标，是参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一步到位建一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经过若干年努力，办成国际知名大学。

这其实也是国内一批大学的梦想。在多年“摸着石头过河”之后，中国大学离这梦想的距离还有多远？像南科大这样的新生高校，能否通过创新，克服传统办学体制机制的弊端，率先实现突破？

近日，在由国内9所一流大学组成的“C9教育联盟”论坛上，校长们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畅所欲言。对于南科大的最新动态和未来发展，校长们也有不少期待和建议。

追赶世界一流

一枝独秀还是群星璀璨？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了20年，但校长们都承认，在学术领军人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很大差距。

像南方科技大学这样的新生高校，能否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

校长们的答案不一。

不少校长认为，要赶上世界一流水平，必须制度创新。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举例说，19世纪德国大学迅速崛起，就缘于组织结构创新，比如：研究所、实验室建制；讲座教授、助教助研等用人制度；连续分级、递进式的新型学术学位制度。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纵观世界历史，无论是中世纪的英国剑桥、牛津，还是19世纪以来的美国哈佛、麻省理工等大学，都是以本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为基础的。换言之，一流大学不可能是中国某个大学一枝独秀，只能是“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以群星璀璨的方式出现。

尊重教育规律

从“英明者领导”到“制度化内生”

对南科大身体力行的“去行政化”，校长们都颇有兴趣，也有不少类似的体会。

不少校长呼吁：政府要按教育规律办学，要避免行政部门对大学管得过严过细，在法律层面确定“管办分离”，使学校与政府建立起一种符合教育规律的外部行政管理体制。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表示，政府部门掌握大量的竞争性经费和教育资源，致使高校和教师经常要“跑部钱进”。要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运行的大学，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公益性质的大学，仅靠大学内部治理的努力，无法实现。

南京大学副校长吕建表示，没有外部环境的松绑，学校内部管理制度的设计只能是一种“先驱者的示范工程”与“稳当者的权宜之计”。学校管理需要有环境适应性。高校要从“英明者领导”向“制度化内生”过渡。

外部环境的“去行政化”，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改革周期——这一点，是校长们的共识。因此，他们探讨更多的，还是如何在学校内部率先“去行政化”，建立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制度和管理模式；如何在现有公立大学占绝大比例、计划办学体制下，借助政府谋求最大的发展。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表示，与国外大学校长相比，中国的大学校长“太累了”，原因便在于缺少良好的内部治理体制，校长不仅要领导组织教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社会服务，还有许多分外的、“难以预料”的责任。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举了一个例子。不久前，复旦大学翻查学校条例，竟发现有 1000 多份条例早已过期，应予废除清理。他说，因为缺少规范，遇事就容易制定新条例，执行与否却要依靠领导班子甚至某一个人的操作。这种现象，在高校中并不少见。

杨玉良认为，重要的是，所有章程制定之后便应长期严格遵守。因时因事随意改变，便不会有大学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近年高校出现的各种学术不端、基建腐败等问题，暴露的是学校管理的漏洞，而解决之道则是学校的“法治化”，有效区分学术、行政等权力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过程。

差距在哪里

缺经费、缺人才、缺特色、缺激情

建设世界一流高校，障碍或问题还有哪些？

校长们的意见集中在几个方面。

缺经费。虽然在全国 2000 多所高校中，“C9”大学在国家财政拨款的教育投入方面，已经占尽优势，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表示，在试图大量引进国际一流人才时，经费的缺口尤为明显。“没有一定的国际可比的薪酬待遇，不可能引进并且留住杰出人才。”

缺人才。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认为，中国的大学在输送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比较大，在集聚人才方面则比较单一，社会各领域精英回流不足，造成了师资结构的单薄。而新世纪人才、杰出青年、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各种人才计划，也过分注重以年薪作为师资队伍的评价标准。

有校长表示，如今，国内顶尖高校对高端人才的争夺呈白热化之势。然而，新引进人才的特殊薪酬福利及科研配套政策，与作过巨大历史贡献的现有主体教师队伍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有失公平，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缺特色。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侯建国认为，每一所大学都存在“资源落后于目标”的问题，因此每所学校选择发展路径和发展战略时，都要在优势学科和国家需求之间寻求最大平衡。而中国大学在找准“火车头”学科，以及形成办学特色上，明显不足。

缺激情。侯建国还表示，目前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理论课偏多，实验与讨论课偏少，专业课程相对陈旧。比起20年前，学生普遍缺乏学习热情，必须打破“课堂灌输、学校圈养、流水线培养”的育人模式，要激发学生的激情和创造性。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也认为，阻碍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忘了大学的使命是“培养人的成长”，重视把专业知识放在学生的脑袋里面，却缺少对价值观、责任心和思考能力的培养。

（来源：2010-10-22 人民日报）

高校校长热议大学建设好大学需吸引力和生产力

在近日公布的多项国际权威高校排名中，创校不到 20 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均位列前五十，给同样“起跑”较晚的中国其他高校带来信心。在昨天举行的“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国内多所高校“掌门人”对如何建设世界一流高校进行了热议。

大学发展，不应做“学舌鹦鹉”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认为，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国内高校确有很大空间，在各方面均可吸取经验教训，借鉴成功案例。但若只是一味模仿某些技术和管理模式，虽短期可有小成，却可能在长远发展中留下诸多隐患，甚至导致彻底失败。

他说，当前的教育系统，可以说是模仿西方建立起来的一套所谓的后发的外生模式。举例来说，所有学科和学术的规范，基本上都来自于美国或是其他西方国家，如果在学术体系建设中不能很好地结合我国学术文化、思想进行融合创新，就很难改变发展过程中的依附地位。“如果我们不能站在世界知识体系的前沿，建设一流大学就是空谈，或者说是一种自娱自乐。”

专家指出，中国应该办出坚守和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而不是当其他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舌鹦鹉。在借鉴海外高水平大学的发展之路时，不应远离对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作为一校发展“舵手”的大学校长，首先要有自己的文化自觉。

大学发展，当垒“九层之台”

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说：“纵观世界教育发展史，无论是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还是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之所以能够一流，都是以国内高校整体教学研究水平为基础的。”专家指出，建设一流大学，需从教育体制出发、从整体发展考虑，才能垒砌“九层之台”，而不能仅对个别学校施以重金，“催生”一流。

多位校长提出，中国的大学要想真正赶上国际高水平大学，就必须通过改革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其他国家的大学崛起来看，跨越

发展多由一系列创新催发，比如说 19 世纪德国大学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其在组织结构上的创新，如建立研究所实验室等全新建制，以及推进讲座教授制度发展等。中国高校应结合自身特点，大胆探索，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大学发展，更重“有人”

“培养出拥有独立见解的杰出人才，是我们大学推行一流梦想的根基所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说，世界一流高校的内涵，不仅止于服务社会、科研探索，它更在于是否担当起为社会发展提供大量人才，培育“中流砥柱”的重任。大学的很多科研成果，若干年后或许将成过眼烟云，人们记住的是“这所大学有人”。这是大学发展的人才之路。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认为，在今天，“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这道做了多年的题目，应引起高校更多思考。“我们往往局限于以自己勾画的社会模型培养学生，以为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这是社会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提出诸多批评的原因所在。”在培养过程中，探索如何更好地培育学生的创新意识、思维能力，已成当务之急。

与会专家指出，衡量一所高校的水平，有多种指标，比如博士点数量、教学名师人数、主持国家级项目数……但归根结底，要看“吸引力”和“生产力”。前者指有多少优秀学生争相投入门下，后者指有多少栋梁之材从大学走向社会。

（摘自：解放日报：2010-10-11）

建世界一流大学国家动作不断 形似容易神似难

“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这个看上去十分宏大的命题，成为昨天出席“一流大学系列研讨会暨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2010”的校长们必须回答的难题。

从 1998 年中国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至今，10 多年来，推动大学发展的动作始终不断，其中去年中国顶尖大学联合成立 C9 联

盟，希望通过跨越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今年“985计划”三期明确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投资大幅度提升等举措，都引起了很大反响。昨天在复旦大学出席研讨会的，是中国9所最有希望迈进世界一流行列的大学校长。在他们看来，中国大学的不少办学指标都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所谓“形似容易神似难”，面对“神似”的难题，中国大学迫切需要探索出属于自己的一流大学建设模式。

一流大学两大难题：师资和学生培养

“中科大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完成国家的公派出国计划了。因为年轻人都不愿意去，他们觉得出国学习一年很辛苦，还要耽误在国内做的事。要知道，中科大的老师80%年龄在40岁以下，支撑他们今后发展的学术研究动力真是令人担忧。”中科大校长侯建国谈起一流大学建设，十分忧虑。

培养杰出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并且为社会做出杰出的贡献，被公认为一流大学的三大特点。但是在人才培养上，校长们对高校的现状并不满意，尤其是对大学以人才培养为本和大学的师资发展，校长们都有一肚子话要说。

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教授展示了一张网状图表，是清华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一些指标的对比。对比显示，两校只在总的办学经费和科研经费上因为差距比较远而不可比，其他指标都处于可比状态，有些指标清华大学甚至还超过了麻省理工学院。但袁驷教授并不认为这样一张图表就说明清华大学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一流大学形似容易，神似难”。因为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大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处于百年之交的清华大学，从去年到今年开了整整一年的教育工作研讨会，才形成了最终的成果，那就是——“再次确定了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而且要坚守百年不动摇。”

除了大学以育人为本的观念，即使是在师资队伍上，绝对差距也是目前所有高校都应该意识到的。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称，我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最大、最核心的差距，是师资队伍。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师资队伍结构都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比

如美国顶尖大学大都有大规模、高水平的专职科研队伍。2009年MIT的专职科研人员达到1722人，与专任教师之比是1.1:1，斯坦福大学的专职科研人员是2624人，与专任教师比是1.34:1，师资队伍的多样性可以丰富校园的创新氛围。而国内的研究型大学现在还纠结于教学型的师资还是研究型的师资，根本无法做到像国外一流高校那样具备丰富的师资队伍。

(来源: 文汇报, 2010-10-11)

发送范围: 校领导

主编: 丁三青 副主编: 李爱彬

执行编辑: 杜卉卉

助理编辑: 蒋凯凯 电话: 0516—83590385

E-mail: fzghc@cumt.edu.cn
